

苏联核战争战略

〔美〕道格拉斯 霍伯 著



苏联核战争战略

(美) 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 著
阿莫雷塔·M·霍伯

张 雪 涛 译
克 雄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苏联核战争战略

作者：D·夫拉斯 (美)
译者：M·霍雷塔 (美)

新华书店
北京

苏联核战争战略

(美) 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 著
阿莫雷塔·M·霍 伯

张雪涛 译

克 雄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³/₄ 印张 126,000 字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5203·005 定价：1.10 元

(内部发行)

原 编 者 的 话

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对于苏联军事能力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巨大增长一直估计过低。美国低估这个最危险的敌手的军事能力，对于它的意图作了错误分析，其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没有充分了解苏联对战争的想法。美国国防部长的言论明显地反映出这方面的问题，他公然表示怀疑，苏联人是否“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明确的意图”。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影响到我们、我们的盟国以至第三世界国家如何估计美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充足与否，还将影响到目前就可能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展开的辩论。苏联是否或多或少怀有明确意图，这也将影响到美国和北约目前即将作出的关于武器系统研制和生产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决定我国今后许多年的国家安全态势。

越来越多的很受尊敬的有识之士开始公开地对我们向何处去提出疑问。苏联人如何推行他们

所选定的方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此，当这份研究苏联军事战略的报告引起胡佛研究所的注意时，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让它尽快地同公众见面。这份分析报告经得起最细致的推敲，一个原因是，它不是以报摊上公开出售的报刊材料为基础；这些报刊，苏联人完全知道西方人是要阅读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是西方公众、新闻界、大学和国会领导人所能得到的主要的（因而也是影响极大的）消息来源。本书的两位作者仔细查阅了只限于在苏联高级官员中发行的书刊，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军政官员若干年来在苏军总参谋部内部刊物《军事思想》上发表的文章。根据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同根据西方能方便地见到并通常加以引用的那些材料得出的结论，是颇不相同的。

我荣幸地把这本非常及时而又重要的研究报告推荐给直接经管战略武器系统及其有关的军备控制谈判的专业人员，推荐给这些专业人员的决策最终所要保护的美国普通公民们。

胡佛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

理查德·F·斯塔尔

作者简介

小约瑟夫·道格拉斯 一九六二年在康奈尔大学获电气工程博士学位。除了在安全出版公司工作以外，还在桑迪亚公司、国防分析研究所和三角关系研究所从事国家安全研究工作。在进入安全出版公司工作以前，曾任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战术技术处副处长。著有《苏联战区核进攻》（一九七六年版）和《苏联在欧洲的军事战略》（一九七九年版）两本书。

阿莫雷塔·霍伯 一九六三年在斯坦福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美国大学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过数学。在进入安全出版公司工作以前，曾在通用研究公司担任军事政策分析组长，专门研究军备控制问题。她是军事行动研究协会理事会理事，而且是妇女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位创始人。

专 家 的 评 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S·克莱因博士
(前国防部情报与研究司司长)：

《苏联核战争战略》有根有据地而且极其有益地考察了苏联对一个极关紧要的问题的见解；它应有助于那些研究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问题和美苏军事力量对比问题的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

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H·尼采：

苏联研究核战略和战术的人们为苏联国内的辩论、启蒙和指导而实际上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对此，本书作了出色的分析；现在这本书与公众见面，是特别及时的。它能使人睁开眼睛。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教授：

这篇研究报告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证明，苏联军界是认真考虑苏美战略战争的前景的，他们正为此而制定所谓的“进行战争”和“赢取战争胜利”的战略。这一证明材料当然会对我们自己的一般战略态势，尤其是对我们看待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态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引言.....	(11)
第二章 苏联对核战争的看法——进行核战争.....	(20)
第三章 苏联进行战争的目标——致胜条件.....	(30)
第四章 苏联军事思想中的战争分期.....	(60)
第五章 战争准备——制订战略计划.....	(88)
第六章 战略力量的目标选择与运用战略.....	(113)
第七章 战略决策.....	(136)
注 释.....	(163)
书刊材料目录.....	(187)

序

这篇清醒冷静和严肃认真的专题论文，为我们了解公众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苏联要干什么？”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只有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得举国一致的认识，才能从越南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才能为八十年代制订出象一九四七年至七十年代初曾成功推行的那种坚定、大胆、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

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和阿莫雷塔·霍伯在《苏联核战争战略》一书中所作出的分析，应列入为数不多的重要论述之列，可以和福伊·D·科勒、利昂·古尔、阿维格多·哈兹尔科恩、约翰·埃里克森、科林·格雷和查尔斯·M·库珀曼等人的近作相提并论。这本书的主题是苏联军事学说。它是在对西方迄今所能得到的苏联军事文献作细致的批判性的阅读之后写成的。书中揭示出的情景，是首尾连贯前后呼应的，也是同苏联发展它可畏的核武库、部署常规力量和核力量

并把这些力量转化为政治压力的行动相一致的。

道格拉斯和霍伯的研究报告揭示出，苏联如何把它的日益增强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作为和计划作为帝国扩张的工具来使用。苏联的一些重要人物经常说，他们所谓的“力量对比”可以用来决定未来世界政治的进程。用明白易懂的话来说，他们确信，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明显军事优势，可以集中用来恐吓美国及其盟国，使它们陷于瘫痪无力，从而使苏联能够通过一个又一个精明灵巧的行动来迂迴、包围和孤立美国 and 欧洲，迫使中国、日本和许多较小国家默认苏联的统治。苏联的军事计划是在对力量布局作敏锐现实的分析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在这一理论的总的范围之内，苏联人抓住一切机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并且通过颠覆、宣传和代理人战争而确实造成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要美国人接受苏联自己对于苏联政策的看法竟如此之难呢？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顾我们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的经历，坚持认为在同苏联的关系中，缓和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现实；苏联的动机同我们的动机一样；苏联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其统治集团年事日高，行事谨慎，

只对维持现状感兴趣。

苏联却表明它的政策与我们想象的大不相同。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苏共政治局委员、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卡累利阿发表的一次正式讲话中，用惊人的语言给美苏之间的缓和下了定义：

在卡累利阿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指出苏联和芬兰之间长期睦邻相处、真正平等和互利合作的重要意义。今天，苏芬关系构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内进行平等合作的完整而稳定的体系。这是体现在日常往来之中的缓和，是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更安宁而且使和平更持久的缓和。归根结底，这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活动的崇高人道含意。

总而言之，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意思，缓和的规则要求美国知道自己的斤两，恭顺谦让，天下大事交给苏联来管，自己则安贫乐道，象一头奶牛一样地为主管天下大事的主人服务，按照新的最高权力当局规定的价格购买原料，出售食品和工业品。

但是我们对这样的言论充耳不闻，我们就是不肯按照苏联重要人物言论中讲得明白的前提来

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

在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辩论是从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口号标语出发的。当前，“再也不要越南式的战争”的呼声同五十年代的“再也不要朝鲜式的战争”的呼声一样强烈。越南战争的灾难重新唤醒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我们十九世纪的孤立和中立地位的怀念。善良的美国人主张，我们只应帮助那些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这类国家为数不多，并且在逐渐减少。他们忘记了我们曾同斯大林结成联盟抗击希特勒，忘记了我们同中国和解来抗衡苏联，忘记了迫于现实而制定的其他许多切合实际的政策。顽固的和平主义思想继续在一个军事化了的世界上泛滥。真正的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同路人仍然在纠集天真的人们，他们的影响显然并没有因为一批感到幻灭的信徒们的接连背叛而受到削弱。

但是美国大多数舆论仍然是讲求实际的，头脑冷静的，对国家极为忠诚。然而，现时有一个根本因素使舆论混乱不堪，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起领导作用。他们是不是实行基辛格的方针，即有关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政策的事实必须对美国人民加以“隐瞒”，而让政府谈判“所能取

得的最好的交易”？

卡特总统说过，我们不应把我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过分害怕”苏联力量的基础上，但是他沒有解释如何区分对苏联力量的适度担心和“过分”担心。一九七八年春季，他在伦敦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说，苏联的军事态势是“进攻性的”，从防御的角度是说不通的。他后来在几次讲话中重申过这一看法。但是到了秋季，他在美国电视台向人数多得多的听众发表讲话说，苏联政策是防御性的，其根源是苏联过分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还说，苏联既沒有谋求军事优势，也沒有谋求用我们无法与之相比的破坏力量来威胁美国或它的盟国。总统作出这种判断，就推翻了一九七八年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中得出的、首次承认苏联在军事领域的目的是取得优势而不是均势的结论。总统说：

我觉得（苏联人）首先希望他们的人民得到和平和安全，他们无疑夸大了他们看来所受到的威胁——因而必须确保能够自卫。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分宽宏大度，但是不会差得太远。

同时，如同我们的做法一样，他们也喜欢扩大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当中的影响，认为他们的政府制度，他

们的哲学，是最好不过的……

他们在军事上的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我们多两倍以上，但是我们仍然比他们强大得多，我们将一直比他们强大，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是如此……即使我们被迫经受苏联人的进攻，我们也经受得起，而且仍然有能力摧毁他们的国家，他们了解这一点。反之亦然。……

我们不打算，苏联人也不打算发展一种用核力量摧毁对方而又使自己不致被摧毁的能力。

总统声称美国拥有军事优势的这番话，同他自己的国防部长的讲话，同公众所能看到的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统计数字，同苏联人建造坦克、舰船、飞机、导弹及其他各种武器的速度，都是相矛盾的。但是他却继续重复这种说法，把它说成是真理。他煞费苦心地把苏联政策说成是“防御性”的而为之辩护，更使人感到不安。这使人想起约翰逊总统在职期间对一位重要参议员的评语。约翰逊总统说，“假如俄国人在墨西哥登陆，那位老兄也会为俄国人找出一个借口。”

这种不和谐的局面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反映。在政府内外都有人表明，虽然他们不想对苏联政策的意图持“危言耸听”或“极端”的态度，但仍然怀疑“缓和”是否兜售得过了头；同

苏联进行贸易，或者在我们的军事计划上持克制态度，或者建立文化关系，或者美国在苏联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这些做法能否说服苏联领导人在非洲、中东和别的地方推行一种较为和平的方针。

对这种无视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真实性的态度起作用的，是一种否认事实的心理机制，正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说的，由于这种心理机制，人们采用“各种保持距离的手法、虚假的类推和干脆否认事实的方式”，以便“不必处置严酷的现实。”

用贝特尔海姆的话来说，“否认”

是人们使用的一种最早、最原始、最不恰当和最无效益的心理自卫方法。当事态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时，否认是心理自卫上最有害的方法，因为它不允许采取有可能防范真正危险的适当行动。因此，否认的做法使得人们极易遭受到他们本来想要防范的危险……当人们面对现实就需要采取不愉快的、困难的或者是代价高昂的行动时，否认现实是比较容易的。

最近一家报纸的报道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它报道说，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举行了

一次会议，这是政府在全国范围为宣传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当中的一次。会议主席开头说，“我觉得苏联人领先于美国。这是大家不愿意去想但却萦回心头的一种忧虑。它是可怕的。”在国务院官员们作了一番叫人们放心的情况介绍之后，会议主席说，“现在我觉得坦然一些了。”

许多有理智有头脑的英美观察家三十年代曾为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找出种种理由和借口，或者把事态完全掩盖起来；如今许多这样的观察家又在走这条老路，对苏联使用几乎同样的言辞。下面的一些话，是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还是指现在的俄国人呢？“他们毕竟被潜在的敌人包围着，需要有更多的武器来自卫。”“他们在国内有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可能考虑侵略别人。”“他们只是在做我们做过的或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在上次大战中蒙受了惨重的伤亡，现在只希望和平。”“他们毕竟不是丈二金刚。”三十年代有人对我们说，希特勒提出的领土要求是到萨尔为止，到奥地利为止，到苏德台为止，或者到格但斯克为止。每次重复这个公式，总有许多人相信，而不顾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有那么一

些自作聪明的人，对力图使西方及时醒觉以防止战争爆发的邱吉尔和罗斯福等少数人摇头叹息，说他们是搞“极端主义”。如今有人向我们保证说，苏联入侵安哥拉是为了“稳定”；苏联夺取非洲之角是防御性的，作用不大；先进的米格飞机在古巴出现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飞机带有核武器（尽管随时都可以用什么方式引进核武器）；因为，用卡特总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的话来说，苏联人已“向我们保证”，苏联仍然遵守一九六二年同肯尼迪总统达成的不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协议。

一些人在苏联问题上乞灵于自我宽慰的想法，我们在三十年代都不曾用这种想法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俄国人是野蛮人，毫无效率，拚命酗酒。他们根本无力向我们发动战争。”谁也没有说过德国人效率不高。然而这种否认的方式使人回想起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时期，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会仿造玩具，造不出真正的战争用的武器。

如今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盛行的否认风，象三十年代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加以类似的否认的风气一样，阻止我们按照贝特尔海姆所说的“承认